

梅兰芳先生与上海戏剧学院的渊源考

■ 顾振辉

日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小儿子、著名的京剧表演家、我院荣誉教授梅葆玖先生过世了。他的过世，引发了海内外各界共同的悼念与追思。殊不知，上戏在建校伊始便因熊佛西校长而与梅兰芳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将依据史料，厘清梅兰芳先生与上戏的渊源。

熊佛西先生自1947年春继顾仲彝先生之后，接任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校长后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风雨飘摇的民国末年里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即便通过周末公演的票房收入也难以继，剧校学生生活一度陷入困境。曾在剧校就读的陈俊逢（后改名陈艰）就曾记得这样一段辛酸而又感人的往事：

蒋经国在沪大搞“限价”，实限民而不限官，忽一夜之间店市全空，一切商品，包括柴米油盐，统统“不知去向”，全校陷于绝粮。时学生食堂经几位师生努力，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山芋，洗干净后用大笼蒸熟，以“开饭”之名共填饥肠。我奉学生会派，在食堂门口当暗哨，因为即使山芋，来路不符合“限价”，怕蒋记“戡建队”来找麻烦。忽见熊校长轻手轻脚地进来，那动作正如他平素夸张表演的“小偷”。要在平时，我必大笑，这时却一点也笑不出来。只见他向门缝一探头，闪电般地缩回，但不走，那头向天仰去，仰到快要向后倒的程度。我怕他真倒，跳过去想扶，门外无窗的过道幽暗，我朦胧见他仰起的脸上有东西闪闪发光，点点滚落，呀！他满脸是泪！后来，又有几次他想把家里那点可怜的“储备”拿出来与学生“要吃大家吃，要饿大家饿”，都被我们婉言谢绝。^[1]

一贯将学生视如己出的熊先生见状自然是心如刀绞，他也决心利用自己在文艺界的影响力，改善“孩子们”学习生活的条件。

熊佛西先生便动员上海当时有名的影剧界人士，在剧校组织别开生面的周末义演，募集了一笔可观的资金。同时，熊校长联合当时同在上海的夏声剧校的刘仲秋校长共同邀请梅兰芳先生为两校义演，以筹募奖学金、资助清寒学生。当时，梅兰芳先生正与杨宝森先生在天蟾舞台进行商演。一向乐善好施的梅兰芳先生欣然应允，答应在商演过后为两校的学生义演三天。

于是，1947年11月27日，剧校校长熊佛西、夏声剧校校长刘仲秋以及梅兰芳先生，联名致函上海市社会局与财政局，力陈他们“为筹募学识讲座基金及清寒学生奖学金等项，经窃承沪上戏剧界先进慨允协助，趁天蟾舞台停演期间，定于十二月二、三、四等日假座义演三天（夜场）。将全部收入（除付零星开销外）其余之款作为学术讲座基金及清寒学生奖学金之用”^[2]，并要求“准予豁免娱乐捐”^[3]。

当年11月29日的《新民晚报》上报道了梅兰芳先生的义举。“名伶梅兰芳，继营业戏结束后，将于十二月二、三、四，三日，继续演唱三天，为国乐剧社。市立剧校及夏声剧校筹募补助基金，剧目二日已定为《凤还巢》，三日为《探



母回令》，四日为《霸王别姬》，该三日票价并不加价，亦不推销，全由天蟾售票处出售。”^[4]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使更多的上海观众能领略到梅兰芳先生那风华绝代的精湛表演，而且，一批为戏剧艺术而孜孜以求的莘莘学子也能得到雪中送炭一般的资助。

三天的义演很快就过去了，在演出的最后一天，夏声剧校校长刘仲秋便与熊校长一同致信感谢梅兰芳先生的义举：

谨启者：

此次筹募讲座基金及奖学金，辱承先生慨允，约请先生赞助进行假座天蟾舞台义演。仰荷先生热心教育、嘉惠青年，毋任钦佩。有劳精神，良深歉疚。先生高谊云情，铭刻不忘。谨此代表全校师生致申谢忱，亮察是幸。

此致

晚华博士、宝森先生暨后台诸位先生

市立试验戏剧学校校长 熊佛西

私立夏声戏剧学校校长 刘仲秋

11日，梅兰芳先生按约将义演所得的六千万国币送至剧校。熊佛西先生当即提笔致信梅兰芳先生，表示感谢：

晚华先生大鉴：

谨启者，本校为筹募学术讲座基金及清寒学生奖学金，辱承台端热心教育举行义演。云情高谊，曷胜荣幸，倾奉惠赐。筹募所得国币陆仟万元，业已转交本校会计室，照收入册。专摺存储银行。至于用途支配，当提交本校行政会议决定。今后校务苟能赖此稍抒困难，饮水思源，蒙感兰沅。本校成立未久，一切未克尽臻，完善当希。时加专素谢忱。另具收据一纸，随函奉上诸维。

荃照祇顿！

台安！

全衔校长 熊佛西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5]

于是，为了感谢梅兰芳先生的帮助，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设立了以梅兰芳先生的字命名的“晚华奖学金”，资助清寒学生。1948年1月30日，学校公布了《晚华奖学金办法》：

查本校前经筹募奖学金，承梅晚华先生热心赞助义演平剧，所得募款业经本校奖学金审核委员会会议决名为“晚华奖学金”。办法八条，兹将上项目办法列后，本校学生如有合于申请奖学金资格于即日起具呈申请书交本校奖学金审核委员会（暂设教务处）以便办理，仰各知照。

此布

熊佛西

一月卅日

一、名额：

暂定廿五名。

二、审核时效：

以六个月为一期，每年二月及九月分两期审核。

三、金额：

每名每月暂以卅万元为准，嗣后得依基金生息之多寡，随时开会决议调整之。

四、清寒学生申请额十五名，其资格如下：

A、凡本校肄业半年以上之学生有成绩可稽，其学业总平均分数及格者。

B、家境确系清寒者。

五、优秀学生奖学金名额十名，其资格如下：

A、学业成绩优异而操行在乙等以上者，由训导处题名。

B、操行成绩优异而学业成绩在乙等以上者由训导处题名。

C、演出工作优异之演员及工作人员由演出工作会题名。

D、一学期内未曾缺课者。

六、停止及递补：凡获奖学金学生如中途发现不合条例或中途退学时，得停止其奖学金。

经委员会之决议以其他同学递补。

七、本办法由本校奖学金审核委员会执行审核。

八、本办法经本校行政会议通过施行。

经过学生申请与校方提名，剧校于1948年3月1日公布了首批“晓华奖学金”学生名单。“石来鸿、陈德坤、蒲映政、韦显、袁化甘、盛鼎、谢依、杨滢、汪汨、石玺、陈珉、吴爱娜、钟高年、纪慕絃、潘千里、王秀、彭涌、殷乃成、程慰世、张宁、朱伯东、王佩秋、徐石平、钱泓光”^[6]共25位品学兼优的同学每人各获得了三十万元的奖学金。这笔钱显然缓解了剧校同学的生活压力，激励着学生继续努力学习。

熊佛西先生还利用这笔资金作为学术讲座基金，“开设了一个电影讲座，轮流邀请电影界著名编导来校讲课，两周一次，全校同学均可自由听讲。阳翰笙、史东山、应云卫、张俊祥、陈鲤庭等分别讲过电影的编剧和表、导演基础知识。这个讲座很有吸引力，每次上课都是座无虚席，教室里挤得满满的”^[7]。

熊校长还将余下的钱为“小剧场购置了八架电风扇”^[8]。这些电扇后来也一起搬到了华山路校区的小剧场里，继续为上戏的师生在夏日里送去清凉，直到后来的改建。

可惜的是，动荡的时局使这笔“晓华奖学金”未能维持下去。1948年夏，国民政府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金融货币体系实行“币制改革”。原来的法币一律被要求兑换成金圆券，原本就是一场巧取豪夺的币制改革，使这笔基金价值大幅缩水。“晓华奖学金上学期结存贰拾柒圆及法币柒佰叁拾贰万元，折合金圆券伍拾陆元肆角肆分。现以此项奖学金经币制改革后为数过少，无法生息使用，决定一次分配学生十一人每人计得金圆券伍元作为辅助缴纳学杂费用。”^[9]

虽然，晓华奖学金未能维持下去，未能让更多的清寒学生得到帮助，但它作为上戏历史上第一个以人名命名的奖学金被载入了史册。梅兰芳先生慷慨相助的高风亮节，也与熊老、与上戏结下了不解之缘。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上海解放也指日可待。让熊先生有些始料未及的是，中共上海地下党也来找他了。当时，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在1948年秋决定建立一个“戏剧电影中心组”，由刘厚生、吕复与吴小佩组成，任务是统一联系剧影界的党员。吴小佩代表“文委”任组长，演剧九队队长兼剧校教师的吕复则负责联系九队与剧校的党员，大多数分散的党员则由当时相对较空的刘厚生联系。

1948年年底，淮海战役激战正酣之际，在中共地下“文委”的指示下，由吕复和刘厚生出面，准备邀请几位知名戏剧家，发起组织一个剧影协会，作为外围组织，用以广泛联系戏剧电影工作者，开展迎接解放的各项活动。“限于当时的环境，先行成立一个筹备组”^[10]。他俩选中了熊佛西、陈白尘、黄佐临与吴琛，与他俩组成了“上海地下剧影协会”的六人筹备组。

从这六个人来看，熊佛西、陈白尘、黄佐临三位既是剧校的骨干教师同时也是当时上海影剧界声望最高的代表人物，而吴琛原是著名话剧编导，那时已转入越剧，正可以代表戏曲方面。

那时，正是时局最为紧张之际，“吕复同志按照地下文委的指示，请陈白尘同志代表组织去找佛老谈的话”^[11]。阅历丰富的熊佛西先生，在一番谈话后，感觉到这是地下党的意图。熊佛西先生又惊又喜之下，毫不犹豫地欣然应允。

就这样，这个中共地下党在影剧界的重要的外围组织——“上海地下剧影协会”六人小组很快就组建起来了。“熊佛老为主任、白尘师和佐临师为副主任”^[12]。1948年12月，地下剧影协会六人便召开了第一次碰头会议。据亲历者刘厚生的回忆：

从第一次碰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约半年时间，我们大约每三个星期左右开一次会。每次开会都相当紧张，因我和吕复首先要照顾他们几位的安全。我至今还记得那时日日不停的警车鬼叫声和夜间巡逻骑队的马蹄声。我们的聚会不可能太多。聚会地点有三处：一是熊佛老的家里，那时他是上海剧校校长，住在闸北大约是宾乐安路（今多伦路——引者注）一所一楼一底的房子，比较僻静，人去多了容易引起注意；还有一处是四川北路路西的一条弄堂里白尘先生的家，但他是挂了号的左翼人物，也不宜多去；最后是佐临先生给我们找了一处好地方，在福州路江西路附近的一座大楼中的一套华贵的公寓里。那是上海巨商吴性裁的办公室，他是文华电影公司的老板，佐临先生是这个公司的艺术主干。这时吴不在上海，办公室空着，佐临有权自由出入。这里不像熊、陈两家那样容易引人注目，而且剧影界客人多，可能给主人添麻烦，而吴的办公室本身就是开会的地方，非常理想，大家都很感谢佐临。

每次开会，我们都是先谈时局，交流情况，特别是战争消息。有几次吕复都带去党的文件宣读，那是大家最愉快也最感动的事。但会上最重要的事则是议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13]

熊佛西先生当时独居住在今天的多伦路上的一所小楼里。每次“地下剧影协会”去他家开会的时候“都各自带一些卤菜茶点，准备有人闯入时，就算是给他做寿而来的。他们一边吃一边谈。佛老对他住宅的周围环境作了分析，都是比较僻静的地方，来往人不多，前后门都安排妥当，进出方便，我们去时，也都约好了开门的暗号，总是由他本人亲自开门。气氛是紧张的，但大家心情是愉快的，佛老的表现也是勇敢的。他曾告诉我，万一有人盘查威胁时，他已经准备好了如何答复的话。”^[14]

当时同在一个小组的吕复还曾记得一次险象环生的经历：

有一次是在熊佛老家，他安排在楼上开会。正在密谈时，突然楼下有敲门声，他机警地约定暗号，独自下楼去。少顷，他笑着走上楼来说：“要是那家伙知道你们在我家开这样的会，那就不容易打发了”。……原来是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的一个官员，被他哄走了。在后来一系列准备迎接解放的工作中，熊佛老对秘密工作的警惕性和灵活性，表现得是颇有办法的。^[15]

地下剧影协会当时主要的工作大致是这几项：广泛联系戏剧工作者，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式和党的政策；做戏剧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印制散发宣传品；对戏剧电影各单位、团体进行调查了解，开展护厂护校运动；组织迎接解放的演出及其他活动等等。“原定要发展一批会员，由于战争形势发展极快，没有来得及进行，就由筹备组成员分头联系许多积极分子开展工作。”^[16]

熊佛西先生在这阶段里除了带领剧校师生一道勉力维持、保护学校财产不被破坏，师生不受迫害之外。还接受了去做梅兰芳、周信芳两位京剧大师工作的任务，确保他们安心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当时，蒋介石早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启动“拯救学人计划”计划将全国有名望的教授、知识分子以及从全国各地选举出来的“国大代表”带往台湾。甚至为表示“道统”所在，将

孔子第七十七代嫡传后人“大成至圣先师侍奉官”^[17]孔德成带往台湾。渡江战役前夕，下野的蒋介石更是准备有计划地将各单位组织撤到台湾。

由于电影、话剧界一向是进步势力的主阵地，主要人员大都倾向进步，而不会离开。中共上海地下党主要还是担心京剧界，尤其是在上海的梅兰芳与周信芳两位大师会在国民党胁迫下离开上海。于是，在1949年三四月间，劝留梅、周二位大师的工作就交给了同样德高望重的熊佛西先生。

经我们研究，认为请熊佛老出面最恰当，他同梅、周都相识多年，谊属同辈。佛老欣然分访梅、周。周先生同地下党员姜椿芳早有来往，友谊深厚，不用多说；访梅先生时佛老要求同他单独谈话，说是受“朋友”之托，来问问梅先生今后的打算，希望能留在上海，不要上当，但要当心被强迫去台；梅当即表示，决心不走，一定留在上海，请朋友们放心。临别时熊说了一句此事请不要告诉别人，梅说我对家里人也不会说。佛老在我们下一次会上兴奋地讲述他圆满完成任务的过程，绘声绘影，我们全都非常高兴。现在回想此事，其实用不着我们动员，梅、周也决不会走，佛老之行，更重要的实际意义是表达了我们党对这些大艺术家的尊重和关心。^[18]

一向倾向进步的熊佛西先生欣然领命。很快，他就来到梅兰芳先生位于今天思南路上的梅公馆，并圆满的完成了该项任务。1961年梅兰芳先生过世后，熊佛西院长在悼念文章中深情款款地回忆了这段经历：

在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反动派运用各种威胁利诱的手段，强迫某些爱国人士和他们一同撤退到台湾去。当时的小报也在造梅先生的谣，说反动派要派飞机把梅先生送到台湾去。我们对于梅先生有坚定的信心，自然不信这些谣言。然而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我们不能不去看看梅先生。于是，在一个初夏的黄昏，我受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委托，带着地下党对梅先生的关爱去访梅先生。寒暄之后，我将来意向梅先生说了，并且着重地表达了党如何关怀梅先生的一切。他听了之后，非常激动，感谢党对他的关爱，便毅然决然地说：“请朋友们别相信外面的谣言，并请转告党，我决不离开上海！我一定和大家一起迎接解放！”他的话是这样的简短，但是那样的刚毅有力。他的声音今天还在我的耳边缭绕。临别，我说：“今天的谈话请勿告人。”他说：“您放心好了，连我的家人我也不告诉！”^[19]

在后来的一次碰头会上，熊佛西先生绘声绘色地讲述，让刘厚生一直记忆犹新：

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分头去看望了梅先生和周先生，谈得很深也很亲切。佛老推心置腹，表示是受“有关方面”委托而来，表示了党对他们的深切关怀。他们分析了形势，鼓励他们不要怕受威胁，但要准备“应变”。佛老说，两位大师表现都很好，都诚恳地保证决不会被反动派胁迫，他们都要佛老郑重地向党转达：“请党放心”这是很有份量、很有勇气的承诺，我已记不全佛老在会上具体说些什么话，但我还记得清楚他那高兴的神态。佛老很容易兴奋，一兴奋就稍有口吃。他为他能够胜利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而这任务又是富有戏剧性的地下工作而神采飞扬。^[20]

光阴荏苒半个世纪后，走出横浜桥、得到长足发展的上戏于2008年4月，特聘梅氏后人梅葆玖先生为荣誉教授。在聘任仪式上，梅葆玖先生拿出一张认真准备过的发言稿，满怀深情地说道：“上海将要解放前夕，1949年4月份，上海戏剧学院首任院长熊佛西和夏衍同志先后来到我们家里，他们是奉命秘密前来希望我父亲留下来的，我父亲欣然同意。熊佛西教授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今天熊佛西教授的上戏给我这个称号，让我做点事情，我感到特别的亲切。”

2012年，上戏建立了梅派艺术研究室，梅葆玖先生再度应邀为研究室揭牌。他在上戏也有优秀的弟子。今天，梅葆玖先生虽然走了，但相信梅派精湛的京剧艺术一定会得到继承

和发扬。梅兰芳先生一家与上戏近半个世纪的情谊，也为中国现代戏剧史留下了一段佳话。
注释：

- [1] 陈琅：《透明，理解却姗姗来迟——参与〈熊佛西戏剧文集〉编纂工作的感言》，《戏剧艺术》，2000年第6期，第24~25页
- [2] 《为佛西等筹募学术讲座基金及清寒学生奖学金约请戏剧界定于十二月二、三、四日假座天蟾舞台义演平剧鉴核准准备案由》，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5-31.0011，第00068页
- [3] 《为呈报筹募学术讲座基金及清寒学生奖学金约请戏剧界名人假座义演平剧呈请鉴核准予豁免娱乐捐以济事功由》，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5-31.0010，第1页
- [4] 《梅郎义演三天好戏》，《新民晚报》，1947年11月29日，第四版
- [5] 《为筹募学术讲座基金及奖学金受到募款六千万元备函中附由》，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5-29.0021，第00086页
- [6] 《皖华奖学金名单》，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5-70.0023，第00028页
- [7] 袁化甘：《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概貌》，《中国现代话剧教育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28页
- [8] 熊佛西：《悼梅兰芳同志》，《上海戏剧》，1961年，第9期，第6页
- [9] 《申请清寒奖学金条例》，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5-87.0067，第00114页
- [10] 刘厚生：《深深怀念白尘老师——写在陈白尘逝世十周年纪念日》，《艺术百家》，2004年，第5期，第2页
- [11] 刘厚生：《熊老在上海解放前夕》，《现代戏剧家熊佛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368页
- [12] 刘厚生：《深深怀念白尘老师——写在陈白尘逝世十周年纪念日》，《艺术百家》，2004年，第5期，第2页
- [13] 刘厚生：《简忆“上海地下剧影协会”》，《话剧》，2006年，第4期，第28页
- [14] 刘厚生：《熊老在上海解放前夕》，《现代戏剧家熊佛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368页
- [15] 吕复：《想念熊佛老》，《现代戏剧家熊佛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364页
- [16] 刘厚生：《深深怀念白尘老师——写在陈白尘逝世十周年纪念日》，《艺术百家》，2004年，第5期，第2页
- [17] 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简称“奉祀官”，是孔子祭典的祭祀官。民国24年（1935年）国民政府改“衍圣公”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由孔子的嫡传后裔担任。在台湾奉祀官为荣誉职，除参与祭典外，还肩负孔孟文化交流等任务。衍圣公：是孔子嫡派后裔的世袭封号。明代为正二品。始于西汉元始元年，当时平帝为弘扬礼教，封孔子后裔为褒侯。之后的千年时间里，封号屡经变化，到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改封为衍圣公，后代一直沿袭这个封号。而到了公元1935年，民国政府取消“衍圣公”，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生于1920年的孔德成，便成为末代衍圣公，首任祭祀官。2008年，伴随着孔德成的去世，“衍圣公”也就划上了句号。
- [18] 刘厚生：《简忆“上海地下剧影协会”》，《话剧》，2006年，第4期，第28页
- [19] 熊佛西：《悼梅兰芳同志》，《上海戏剧》，1961年，第9期，第6页
- [20] 刘厚生：《熊老在上海解放前夕》，《现代戏剧家熊佛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368页

责任编辑 原旭春